

## 新文化运动与启蒙 ——对当前研究倾向的反思

○ 尹保云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摘要]**近些年对新文化运动的研究集中在启蒙问题上,然而,这类研究很少把新文化运动与启蒙思想体系作具体的比较,揭示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并指出它在理解启蒙思想上的不足之处,而是聚焦于区分“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这个区分不仅客观上很困难,而且导致对新文化运动的贬低,甚至与以反启蒙为主旨的后现代主义形成合力,从而全盘否定了新文化运动。这一研究倾向的存在,暴露了学术界目前在思维方法上存在着一些深刻的问题,需要加以认真地纠正。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启蒙;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后现代主义

新文化运动与启蒙的关系,是当前学术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以往,国内对新文化运动有统一定调,把它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围绕反帝、反封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这个线索,对新文化运动加以提纯。统一定调不提“启蒙”,因为这个词包含着更多的东西。每年5月4日前后,一些大学里组织的相关学术会议,都是按照统一定调而突出新文化运动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意义,成为必不可少的政治性活动。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大量的研究不再遵循统一定调,而是以启蒙为主题重新评价新文化运动和“五四”。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与统一定调对立的,它从“激进主义”方面批评新文化运动和否定“五四”,甚至全盘否定新文化运动。学术界由此陷入思想混乱,统一定调的思想地盘越来越小,而聚焦于启蒙的多元化观点也没有达成重要的共识。在纪念新文化运动100周年之际,对目前的研究倾向作一认真反思是十分必要的。

## 一、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意义

要从启蒙视角研究新文化运动,需要对启蒙的基本思想有比较全面的理解。众所周知,欧洲启蒙运动发生在17世纪和18世纪,在北美延续到19世纪初,日本发生在明治维新之后。启蒙运动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针对的是封建思想桎梏以及专制制度,是从传统文明过渡到现代文明的一个思想分水岭。启蒙的思想体系十分庞大,霍布斯、休谟、洛克、亚当·斯密、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贡斯当、康德等都经常被当作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启蒙思想渗透在这些人的著作和其他文献中,其中有很多思想还是相互矛盾甚至相互对立的。尽管如此,对启蒙运动却不可随便下定义和任意解释。概括地说,它有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1. 天赋人权(或自由权利)思想。它认为人人生而平等,享有不可侵犯的生存权、财产权、名誉权等天然权力。这是从文艺复兴到启蒙的基本信念,一些学者认为这个思想在欧洲兴起与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原则的传播有联系;2. 理性的概念。这是启蒙思想家对人类普遍本性的认识,它包含着反对各种宗教迷信和权威崇拜、合理安排自己的欲望、承认普遍性的价值等思想。从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的“理性”词条看,这一概念也受到儒学思想的启发;3. 民主制度的设想。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呼吁把“王权”作为个人权利的保障,那么启蒙思想家则探讨了制约国家权力的民主制度,洛克、孟德斯鸠、康德对此均有重要的思想贡献。这三个方面相互联系,虽说不代表启蒙思想的全部,但也反映了启蒙思想的最基本内容,很难再进一步简化。

按照这三个方面来衡量,中国发生在1915年至1923年之间的新文化运动毫无疑问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早期的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是反孔非儒,讨伐封建道德以及封建制度和各种习俗,推广白话文和社会风气改良,这属于一般启蒙运动的反封建内容,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与此同时,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骨干们大力倡导个人自由、个人主义、个人权利、平等、民主、科学、立宪等启蒙价值观,更是与欧洲和日本的启蒙运动的一般思想切合。“五四”运动后思想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一部分新文化运动的骨干转向马克思主义,但这个时期突出了“赛先生”和“德先生”两个口号。这两个口号虽然收缩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内涵,但仍没有偏离启蒙路线,它们分别与上述第2和第3方面的启蒙内容相对应。

当然,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启蒙运动并非同一个模式,虽然基本思想和方向相同,但是在各自具体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因此,各有其不同特点。比起英国和美国的启蒙运动,法国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显得比较思想激进,这是因为法国封建势力顽固,启蒙运动也突出强调民权思想以与封建势力对抗。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受到日本启蒙运动的影响较多,但二者也有很大区别。总的来看,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有以下不足之处:首先,对人类存在着普遍性价值的认识不足,所以在批判儒学文化传统时,连忠、孝、节、礼、义、仁、智、信等跨时空的恒常性道德也一块儿否定,这对启蒙思想是一个很大的偏离。欧洲启蒙思想家们承

认人类有永恒的、普遍性的价值的存在,所以他们不去触动一般道德体系,也不否定《圣经》;其次,对“天赋人权”(或“自然权利”)的概念理解不深,重视不够,所以后来也就不再强调了,而只强调“科学”和“民主”两个方面;第三,对自由经济制度和宪政民主制度的意义理解不深,因此在制度建设的方向上犹豫不决。

在上个世纪初,中国对世界现代文明所知不多,更缺乏深刻的理解,同时,那时社会科学体系也没有建立,所以,新文化运动存在这些不足也在所难免。这些局限性并不否定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意义,作为一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是名副其实的。后辈学人研究新文化运动,应该按照启蒙的一般内涵来总结它的思想贡献和不足,理清并深入阐述启蒙思想,这样才能达到理解前人和弥补整个民族的思想局限的效果。然而,国内学界的研究并非都是遵循这个思路,一个突出的倾向是站在片面角度加以肯定或否定,纠缠于“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的争论,最终可悲地掉进后现代主义否定一切的泥潭。

## 二、“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的区分

以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两个概念把新文化运动分成两派或两个运动,在这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李泽厚曾提出“启蒙”与“救亡”的区分,但他的论述比较粗略,只是说因为救亡而启蒙被打断了,并没有认为救亡就是激进主义。在后来的研究中,这一区分逐渐发展为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的区分。

“左翼”与“右翼”的区分早就有了。按照统一定调,左翼就是好的和革命的,而右翼是不好的和反革命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吴虞等是左翼的代表,胡适、梁漱溟、晚年的梁启超、康有为等常被看作右翼或保守的代表。但在80年代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与启蒙关系的研究中,这两个词的褒贬意义被倒过来了。“右翼”是自由主义启蒙,通向一条温和的变革之路,而“左翼”是激进主义启蒙,通向后来的“文革”极左路线。有学者把启蒙运动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苏格兰的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文明演进论的启蒙,其特点是比较温和的、渐进的,另一种是法国激进主义的启蒙,是拥抱革命的激进主义;胡适、晚年梁启超的启蒙思想类似前者,而陈独秀、李大钊则代表了后一条路线,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革命思想的谱系”。<sup>[1]</sup>这种区分的目的,一是把新文化运动保护起来而避免被全盘否定,一是把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拯救出来,避免在否定激进主义中遭到一锅煮。余英时曾在1999年写了《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文,他认为文艺复兴是温和的,是“文化与思想的规划”,而启蒙运动是激进主义的,是“经过伪装的政治规划”;胡适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是文艺复兴式的,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则是启蒙运动式的。<sup>[2]</sup>这样把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对立起来很荒谬,因为欧洲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是连通的,并且文艺复兴也有“政治规划”即王权制度。余英时如此勉强,目的是要把胡适一派同激进主义道路划清界限。

新文化运动的实际情况很复杂。如果以激进主义划线,胡适的思想也很激进。就像林毓生等学者指出的,胡适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同样是“激进的全盘反

传统主义”。胡适不仅全盘地反对传统文化,而且也同样受到苏联道路和列宁主义的影响。首先,胡适同样赞扬苏联经济模式。余英时也承认,除了反对走阶级斗争道路外,胡适“从1926年到1941年,他(胡适)一直都对苏联和社会主义抱着这种比较肯定的态度”。<sup>[3]</sup>直到1947年8月1日,胡适在北平广播电台发表《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的讲话中还说“财产权已经不是私人的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了”<sup>[4]</sup>;其次,对宪政民主制度产生怀疑也不仅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胡适等右翼人士也是同样。在20年代,梁启超在欧洲参观一趟之后,回来宣布西方宪政制度已经过时了,中国没有必要学习它,要搞自己的新的政治模式。当时不少人受到这种看法的影响,胡适也不例外,他怀疑政党政治的可行性,提出了“无党政治”的口号。尽管他后来一直呼吁“民主”,但由于他对个人权利(尤其是私有财产权)的理解不深刻,他对民主发展逻辑的理解也难免表面化。

激进主义是一个需要具体分析的概念。一般而言,激进主义就是在某思想体系中抽出部分、少数或个别思想口号加以强调而排斥其它,从而整体上偏离了这个思想体系。黑格尔是从启蒙思想中抽出“自由”加以强调,马克思抽出“自由”和“平等”等少数几个口号而建构思想体系,从而使他们的整个思想不属于启蒙思想的范围。沃勒斯坦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启蒙思想的一个激进主义的分支,这种看法很快在国内流行。然而,这种划分不适合用来讨论新文化运动。因为,在整个新文化运动时期,即便是陈独秀、李大钊这样的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骨干,他们对苏联模式和列宁主义也只是刚刚接触。在这个时期,他们的思想还是属于启蒙运动的,对启蒙的一些关键思想的理解不够深入,而且,救亡图存的急切心理、苏俄模式的突然出现,也干扰了他们的冷静思考。与其勉强分成两派,还不如具体地指出他们在对启蒙思想和现代文明认识上的共同局限。

区分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的进一步目的是找出“文革”的历史根源。在一些学者看来,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启蒙路线与“文革”有内在的联系。有学者写道:“五四”的激进主义启蒙开了“文革”的先河,“‘文化大革命’正是启蒙的后果,是顺着启蒙思路加以推进而导致启蒙的破产”;“要真正终结‘文革’,必须真正终结‘五四’”。<sup>[5]</sup>这个结论令人吃惊,但它却与统一定调有某些联系。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把“五四”称为“文化革命”,这个论述容易引发一些人由反对“文革”而回头去否定“五四”。同时,一些赞扬和怀念“文革”的人也可以利用毛泽东的这个论述。近年来,不少网络文章从“左”的立场出发,把“五四”和“文革”一起肯定,强调“文革”的“革命性”意义。赞扬“文革”的立场与否定“文革”的立场本来是完全对立的,但二者却都把“五四”与“文革”等同。

把“五四”与“文革”扯在一起过于勉强。“五四”是爱国学生的抗议政府活动,而“文革”却是对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效忠运动;“五四”的精神是“民主”,而“文革”的精神则是“万岁”。在新文化运动中,“五四”是由巴黎和会的不平等条约激起的一次突发学生事件,应被看作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插曲。作为学生运动,它有正义性、合理性的一面,但也有骚乱性、无政府主义和无理性的一面。统



一定调把“五四”抬高到新文化运动之上,说成是新文化运动的结晶,非但不能成为权威结论,反而给否定新文化运动观点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以上说明,对新文化运动的启蒙问题的研究,既没有对照启蒙思想肯定其历史意义,也没有通过理论阐释来弥补中国思想长期存在的缺陷和不足,而是把精力集中在划分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两条路线上。这样简单化的研究,给后现代主义观点的嵌入提供了机会。

### 三、后现代主义对新文化运动的全盘否定

众所周知,后现代主义兴盛于上个世纪 80-90 年代的西方国家,很快传播到中国大陆。广义后现代主义是由很多小的思潮所组成,它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后结构主义、深层生物学以及狭义后现代主义。这些学说虽说涉及问题不同,但总体上是非理性和反理性的思潮。狭义后现代主义(包括“深层生物学”)则是直接针对现代文明而起,它否定启蒙理性,否定一致的现代性,反对普世价值,否定宏大叙事,否定一般历史规律的存在而主张极端的历史相对主义等,总之,后现代主义的一套思想与启蒙思想体系是完全对立的,是反对现代化和现代性的,专门把启蒙运动当作批判和攻击的对象。

由于后现代主义是非理性主义的思潮,它虽然在西方国家 80、90 年代喧嚣一时,也对学术界产生某些影响,但它主要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并没有真正进入学术殿堂,若说有学术,也只是“非主流”。在日本和韩国,后现代主义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它在中国大陆却获得了巨大的生存空间,90 年代后广泛地渗透到哲学、文学、历史与社会理论等领域,有的学者主动把它当作新思想、新启发而完全接受,以替代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框架,也有的是不知不觉地受其影响。

由于其反启蒙的本质所决定,后现代主义自然成了否定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力量。持后现代主义立场的学者,对新文化运动的看法是完全否定的。有位学者在文章中阐述了这样的道理:新文化运动按照启蒙的标准把中国传统文化否定,是“被论定的文化置换”;新文化运动否定中医、在大学用现代知识替代传统经学等,都是“变相的思想专制”;这篇文章还进一步说:在新文化运动发生之时,西方国家走向尼采、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为代表的新思想,正在脱离启蒙,而新文化运动却恰在此时搞启蒙运动,这显然“不合理”。<sup>[6]</sup>这样把整个新文化运动看作完全错误和不合理,显然是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的版本。

广泛渗透的后现代主义有多种表现形态。如果说全盘肯定传统文化而否定现代文明的“文化守成主义”和否定一般规律的历史相对主义,本身就属于后现代主义的变种,那么,也有很多学者是因为受其熏染而在评论某些问题时,不知不觉地站到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如,一位学者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新文化运动所确立起来的现代中国构想,是一个启蒙的乌托邦。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文化更新主义者这三大思想派别,尽管彼此之间存在着种种异同,却都非常自觉地聚集在这个启蒙的乌托邦理念之下,而它们的思想也被启蒙这个乌托邦理

念所限制。”<sup>[7]</sup>这种观点显然是后现代主义的,因为从来也没有人把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同类而加以批判,只有后现代主义才这么干。这种观点的底层,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反理性和反“宏大叙事”,它不问方向、路线、细节等等的不同,把所有属于理性规划的东西都看作是不好的。

后现代主义的鼻祖是尼采,但它的反启蒙却是借用了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批判理论,他们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论述“启蒙的概念”时,把启蒙的庞大思想体系抽象为“启蒙理性”,并进一步把启蒙理性解释为“管理化”或对人们自由的各种理性化限制。<sup>[8]</sup>后现代主义者如鲍曼、罗蒂等,以及福柯的后结构主义,都是从不同角度发挥和利用这个狭窄和扭曲的启蒙理性定义,以达到从根本上否定启蒙运动之目的。西方学术界因为理性思维强并且以启蒙思想为根基的学术传统早已牢固奠定,所以不易被后现代主义的思想侵蚀。但国内学术界却没有这样的思想免疫力,所以很多学者受其迷惑,把它作为一种新思维而接受了。这包括“正统”马列主义学者在内,他们一方面板着脸孔坚持统一定调,另一方面却贬低现代文明、否定一致的现代性、否定普世价值和宪政制度、否定启蒙,等等,与后现代主义如出一辙。在反对启蒙思想、破坏新文化运动的声誉上,“正统”马列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

#### 四、需要纠正的思维方法

本文以上说明,目前对新文化运动研究的一个突出倾向是从纠缠于区分两派而走向全盘否定,不仅在学术思想和理论上没有很大的进展,反而招致非理性主义的混乱。要纠正这一倾向,需要解决思维方法上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第一,不能用历史寻根的方法而把复杂历史抽象成一个单线条。无论是统一定调还是围绕启蒙问题的各种观点,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单线索地寻找历史源头。统一定调的观点把“五四”运动抬得很高,是从中共后来在大陆的成功夺取政权出发而追溯以往,从而把历史抽象为一条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线条。同样,否定“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观点则是从1949年后毛泽东时代左倾路线的错误出发而追溯以往,从而把历史抽象为一条激进主义不断发展的线条。这两种观点在意识形态上是完全对立的,但思维方法却完全一样,都忘记了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共夺取大陆政权,时间相隔遥远,除了这个线条外,还有很多横向的和纵向的历史线条。如果把这段历史理解为一个单线条,就自然地忽视掉新文化运动的很多内容,难以充分理解其历史意义。

第二,不应赋予一场文化运动太多的历史责任。按照当时的国际背景,即使没有新文化运动和“五四”,马克思主义也照样会在中国传播,共产党也有夺权成功的可能;反之,有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也不决定共产党后来必然发展壮大。在国际列强包围的格局下,中国历史并非沿着其内在逻辑发展。新文化运动只局限于在部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传播,并非当时的主流统治思想。别说是左翼骨干,即便是长期被看作“右翼”或“自由主义”代表的胡适,其思想与

国民党主流统治思想也不合拍。孙中山的“民生”和“民权”学说对私有财产和宪政制度的理解,显然更接近自由主义启蒙的真谛,而胡适却没达到这个深度。

这就是说,新文化运动并不是当时的主流思想和政治运行,后来的历史更不应由它承担。新文化运动和其它的思想启蒙运动一样,主要是思想的和学术的活动。一个学术思潮和思想运动要变为现实的政治行动和社会运动,需要经过多个层次的转化。过分抬高某个思想运动、某个学说或思潮对于历史发展的决定性意义是不切实际的,这还会养成从思想上解决问题的思维习惯,从而把思想意识形态斗争的作用拔高而忽视了现代制度的建设。

第三,不宜热衷于同国外非主流学术接轨。前面指出,新文化运动的局限性在于它对启蒙的有些思想理解不够深入,因此启蒙路线不坚定而容易发生转移。这是当时一代人在知识上、理论上、眼界上的局限所致,尤其是被突然崛起的苏联模式转移了思维。而现在,历史已经过去100年了,改革开放推进了快40年,上个世纪80-90年代苏东阵营解体接近30年,教条主义也随之在全球衰落,这一系列的变化使以往潜藏很深的历史逻辑清晰地显露出来。在历史已经做出结论的情况下,如果还继续重复以往的错误,总是认为现代文明没有一般性或者已快过时,忙于同西方国家的非主流思想接轨,甚至努力把西方的非主流思潮推高为中国的学术主流,乐此不疲地否定和排斥先进文明与先进文化,站在世界历史潮流的对立面,那就不可原谅了。

实际上,同新文化运动一代人(包括左翼和右翼)相比,今天的学术界是倒退了而不是前进了。尽管有各种局限性,新文化运动不愧为一场实实在在的思想启蒙运动,给后世留下了不断追求、敢于追求的精神。无论是在1949年前的民国时期,还是在之后的毛泽东时代,新文化运动所标志的追求先进性、奋发向上的精神,都默默地鼓舞着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甚至在“文革”期间,它也是给人们带来鼓励和希望的夜空灯塔。而在改革开放深入推进的今天,学术界却堆填了一个僵化的、板结的、权力化、金钱化和泡沫化的土壤,一方面抵制以启蒙思想为根基的主流学术,一方面被反启蒙的、反现代性的各种思潮大举占领学术阵地,这个现象的确是让我们愧对先贤。

### 注释:

[1]高全喜:《文明演进论的视角审视“新文化运动”及其嬗变》,复旦大学2015年3月14-15日召开的新文化运动百年反思之二:“问题与主义”学术研讨会论文。

[2][3]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三联书店,2012年,第84、222页。

[4]胡适:《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胡适文集》(12)卷六,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

[5][7]唐文明:《从启蒙的蒙蔽中解放出来》,《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2日,第6版。

[6]张祥龙:《深层思想自由的消失——新文化运动后果反思》,共识网,2010-01-02,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pl/sx/article\\_201001203866.html](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pl/sx/article_201001203866.html)。

[8]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